

特稿

戴雅门文
撒母耳译

作者戴雅门 (Larry Diamond) 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和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莫斯巴赫 (Mosbacher) 全球民主高级研究员，也是美国《民主季刊》的联合创始编辑

译者撒母耳 (笔名) 是中國大陸专业人士

中国民主季刊

第 2 卷 第 2 期
2024 年 4 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权力、绩效 与合法性

编按：这是当代著名民主问题研究专家戴雅门 (Larry Diamond) 教授 2023 年 12 月 6 日所作的、第 20 届西摩·马丁·利普塞特年度世界民主讲座。他从权力、绩效和合法性三个方面探讨了如何重振世界民主的势头。在讨论全球民主所面临的挑战时，戴雅门教授也对香港、台湾和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给予了敏锐的关注。“世界的自由事业是不可分割的”，戴雅门教授说。

此文发表于 2024 年 4 月 1 日出版的美国《民主季刊》第 23 卷第 2 期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35, Number 2 April 2024, <https://muse.jhu.edu/pub/1/article/922830>)。感谢《民主季刊》提前分享英文原文，使我们得以快速翻译此文、发表其中文版。

我们如何才能重振世界民主的势头？我认为做到这一点有三个关键：权力、绩效和合法性。这最后一点，即合法性，是一种信念，正如西摩·马丁·利普塞特 (Seymour Martin Lipset) 经常说的那样，就是相信一个国家现有的政治制度在道义上是正确和适当的，是最好的政府形式。

我将逐一讨论这三个关键点，但首先，让我们考虑一下当今全球的民主状况。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认为世界在 2007 年前后进入了民主衰退，而且这种衰退还在不断加深。在一线致力于实现、捍卫和改善民主的人们和组织都认同这一评估，但学者们对此存在争议。因此，首先让我们简要地考虑一下证据。

我用两种方式评估民主：一种是类型定性 (categorically)，即存在或不存在民主；另一种是程度量化 (continuously)，即一个从 0 到 100 的量表，其中的数值是三个主要的、对自由民主的年度衡量数值的平均值。这三项

衡量数值分别是“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综合分值、“经济学人智库”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 发布的民主指数, 以及“民主多样性项目” (Varieties of Democracy project, V-Dem) 发布的自由民主指数。为了追踪趋势, 我将这三个衡量数值平均化——把这个平均值视为“调查的汇总” (poll of polls)。

要评估一个国家是否是民主国家, 我会问该国人民是否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来选择和更换他们的领导人。如果不同的政党和候选人可以参加竞选, 人民和团体可以组织起来支持他们的候选人, 并能够批评现任者, 而且实行无记名投票以及政治暴力较少, 那么选举就是自由的。当选举由公正的官员和法院管理, 当有合理公平的竞争环境来利用媒体和其他资源, 当有成人普选权并对投票和计票进行独立监督时, 选举就是公平的。¹ 在许多国家, 这些条件受到了损害, 因为对公民自由没有平等保护、腐败泛滥、法治薄弱。民主的倒退主要发生在这些不自由的民主国家 (illiberal democracies)。

为了区分出“自由的”民主国家, 我将这样的国家计入此类别, 即在“自由之家”对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分别的评分中, 该国两项都得到了 a1 或 a2 的最佳分。

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属于选举民主国家可能会很难, 因而可能会引起争议。许多民主国家已经严重衰落, 但如果它们避免彻底撕毁宪法, 继续举行多党选举, 就很难说它们是否仍然符合选举民主的最低条件。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 土耳其、孟加拉国、委内瑞拉、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贝宁已成为威权政权。但其他的案例, 如匈牙利和菲律宾, 仍然存在争议。

匈牙利是最常被错误归类为“民主国家”的国家，从而为总理维克托·欧尔班 (Viktor Orbán) 自豪地称之为“非自由的民主”提供了不应有的合法性。欧尔班在 2022 年的连任竞选中大获全胜，这表明“专制者可以合法地操纵选举，利用议会多数修改法律，使反对派采取的任何战略都归于无效”。² 对民主的检验，不是一个政权是否关押政治犯和强加无处不在的恐惧气氛，而是人民能否在自由公正的选举中选择并更换领导人。欧尔班和他的“青民盟” (Fidesz) 执政党几乎完全控制了大众传媒，同时肆意对选区进行不公正的划分，并将公务员、司法部门和其他监管机构高度政治化。欧尔班所推行的不是一种非自由的民主，而是一种非常狡猾的独裁。

从积极的方面看

现在来看看证据。积极的一面是史蒂文·列维茨基 (Steven Levitsky) 和卢坎·韦 (Lucan Way) 所说的“民主的惊人韧性 (resilience)”。³ 在过去的 15 年里，大多数自由民主国家确实证明了这种韧性。2006 年，在人口超过一百万的国家中，自由民主国家的比例达到了 34% 的峰值，此后仅下降了 4 个百分点。⁴ 除匈牙利外，所有欧盟成员国——与大多数先进工业国家一样——不仅仍然是民主国家，而且是自由民主国家。巴西在 2022 年 10 月总统大选后的几周内险些发生民主中断，当时落选的在任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 (Jair Bolsonaro) 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并争取支持者以采取可能的努力规避选举结果。但他被迫承认失败并离职。2023 年 6 月，巴西选举法院取消了博索纳罗在 2030 年之前参加未来选举的资格，因为他在选前毫无根据地声称投票系统会被操纵——这违反了巴西的选举法。

在阿根廷，失控的通货膨胀率到 2023 年 11 月高达 161%，导致 40% 的

人口陷入贫困。⁵ 2023 年 10 月至 11 月总统选举中的辩论，是关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愿景和上届政府的表现，而不是关于是否保留民主。民主发挥了作用。糟糕的政府表现导致腐败无能的庇隆主义 (Peronist) 执政党的决定性失败。但 56% 的阿根廷人在选举哈维尔·米莱 (Javier Milei) 时所投票支持的激进变革，也拒绝了 40 年来摒弃军事独裁统治、支持对侵犯人权行为问责的全国共识。⁶ 在智利，长达数年、高度重要的宪法改革在 2022 年的全民公决中惨败。在自由民主的胜利中，选民们正确地反对了将一系列含混和令人困惑的环境、社会与身份权利纳入宪法。⁷

在自由民主国家中，党派和意识形态的两极分化往往严重得令人担忧，而政治宽容和信任也受到侵蚀。但许多第三波民主国家似乎仍然强劲有力。许多民主的逆转或退化都是暂时的；新兴独裁政权在巩固自身方面面临着巨大的障碍。⁸

此外，民主的倒退是可以逆转的。在 2022 年欧尔班领导的匈牙利以及 2019 年和 2023 年埃尔多安 (Recep Tayyip Erdoğan) 总统领导的土耳其，民主反对派都在选举中努力奋争。土耳其威权政府禁止深受欢迎的伊斯坦布尔市长参加 2023 年的总统竞选，这或许是埃尔多安得以保全的唯一原因。同年 10 月，积极的政策议程和年轻选民的踊跃投票使波兰的民主反对派取得了胜利。波兰“公民平台” (Civic Platform) 的胜利不仅阻止了波兰民粹主义的“法律与公正党” (Law and Justice party) 8 年来对自由民主道路的滑离，也再次印证了土耳其 2019 年市政选举、希腊中右翼的自由宪政力量 (liberal-constitutional forces) 同年在选举中战胜左翼民粹主义者，以及欧洲和其他地区的经验。当支持民主的力量团结在一个能够表达选民关切、凸显现任者的失误和腐败的纲领背后，并通过广泛呼吁对民

主友好的“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来超越民粹主义的两极分化时，反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力量就可以在投票箱中被击败。

法院和公务员等国家机构及时和强有力的反制行动，⁹ 以及利用民主的制度手段追求温和目标的政治和公民战略，也遏制了民主倒退的趋势。哥伦比亚反对派就是这样挫败了 2002 年 -2010 年任总统的阿尔瓦罗·乌里韦(Alvaro Uribe)“膨胀行政权力、损害法院和国会以及收编监督机构”¹⁰ 的企图。

民主的长期衰退

但遗憾的是，许多旨在颠覆民主的努力并未得到遏制。因此，我们仍然处于长时段的民主衰退之中，具体表现为以下四种趋势。

首先，在人口超过 100 万的国家中，至少是选举民主国家(这一类别包括自由民主国家，但范围更广)的比例，已从 2006 年 57% 的峰值下降到如今的 43% 左右。¹¹ 经过艰难的判断，我将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列入了民主的背叛者之列。¹² 然而，即使撇开这两个国家不谈，全球趋势也明显是负面的。如果我们不能再把这两个大国算作民主国家，那么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口比例已从 2006 年的 55% 降至今日的 25%。

其次，自 1974 年第三次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开始以来，每个十年的民主崩溃率都在上升。1980 年代，民主崩溃率为 8%，而结束于 2022 年这个十年中，民主崩溃率达到了 19%。

第三，向民主转型的比率一直在下降：在 1983-92 年期间，36% 的专制国家成为了民主国家，而在随后的三个十年中，这一比例下降到了 30%、21%，结束于 2022 年的十年中则为 12%。

在较大的国家中，本世纪几乎所有的民主动员都以失败告终。本世纪迄今为止，只有两次引人注目的大众民主运动实现了民主转型。而且，这两场运动都是在本世纪头十年开始的：“橙色革命”（2004 年底发起）之后的乌克兰和“阿拉伯之春”（2010 年底发起）后的突尼斯。其他每一次为实现或恢复民主而进行的大规模民众动员（通过选举、大规模群众抗议或两者兼而有之）都未能实现目标。失败的案例包括缅甸、伊朗、苏丹、土耳其、委内瑞拉和埃及以及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民主崩溃的速度不断加快，而转型的比率却在下降，这意味着世界上的民主国家越来越少，实际上比 2007 年要少很多。

第四，“自由之家”从 2007 年到 2022 年的数据显示出一种延续的态势，即自由度下降的国家数量远多于自由度上升的国家数量。2022 年的相对下降幅度非常小，但在 2023 年，“自由之家”再次发现，自由度下降的国家数量是获得更多自由的国家数量的两倍多，而且下降的幅度比进步的幅度更大。

民主倒退最令人不安的案例，是直到最近还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印度。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 及其领导的“印度人民党” (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 自 2014 年执政以来奉行的印度教沙文主义 (Hindu-chauvinist) 政策，使这个大国长期以来在政治多元化、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和宗教宽容方面的纪录遭到了严重破坏。

正如玛雅·图多尔 (Maya Tudor) 所写的，威权主义工程在印度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现任官员的更替在选举上虽然仍是可能的，但却不可能实现，因为莫迪政府已大幅度侵蚀了对公民自由和行政权约束体系的实际保护。”¹³ 恐惧现在笼罩着媒体（包括社交媒体）以及学术界、知识界甚至艺术表达的世界。由于“独立记者普遍受到骚扰，媒体所有权结构的集中化”¹⁴，自我审查现在已成为常态。根据“自由之家”的数据，印度的互联网自由度在 70 个国家中已排名到后半部分，落后于安哥拉、摩洛哥和新加坡等专制国家。¹⁵ 目前，印度在由政府主导的互联网封锁方面处于领先地位。¹⁶ 印度人民党经常利用执法作为武器来恐吓和惩罚反对者。

该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 (Hindutva, Hindu nationalism) 意识形态，以正式的歧视性法律和知名领导人公然的偏执言论为代表，推动了针对印度穆斯林少数民族暴力浪潮的兴起。苏米特·甘谷利 (Sumit Ganguly) 认为，这些对民主和人权的攻击之所以更加凶险，正是因为它们是旨在永久转变印度政治制度的工程的一部分。如果说印度今天仍然是一个民主国家存在争议——正如我已经说过，我并不认为它是——那么，“印度未来将仍然会是一个民主国家，这一点却远不能确定”。¹⁷

现在流行的一个说法是，民主倒退的断言反映了一种“近期偏见” (recency bias)，忽略了之前专制滥权的历史。是的，许多倒退的民主国家（包括印度）都是低质量的民主国家，其特点是“无效的多元化” (feckless pluralism) 或“恺撒式的、公选的行政首脑”。¹⁸ 然而，在过去二十年中滑向民主失败或处于民主失败边缘的国家，都曾一度是真正的、竞争性的民主国家。这些国家包括贝宁、萨尔瓦多、泰国、土耳其和委内瑞拉，它们现在都是威权国家，另外还有印度、墨西哥、菲律宾和南非，这些国家的情况已经

严重恶化。

为了评估 2006 年至 2022 年间的全球趋势，可以采用我的 100 分制民主量表（分别根据自由之家、V-Dem 和 EIU 发布的“三大”数值进行平均），并询问在这些年中，有多少国家的得分比最高分至少下降了 5 分，又有多少国家的得分比最低分至少提高了 5 分。¹⁹ 在此，我剔除了人口少于 100 万的国家，同时也将 45 个“大”国家（人口超过 5000 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5000 亿美元，或两者皆是）列为特别观察对象。在经历重大变化的 21 个大国中，有 19 个国家出现了衰退。其中 11 个在 2006 年是民主国家，如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南非和土耳其——以及美国（这组国家中唯一的发达工业化民主国家）。在此期间，只有两个大国的民主取得了显著改善：哥伦比亚和台湾（成为第三次浪潮中最自由的民主国家之一）。在经历重大变革的 8 个专制大国中，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变得更加专制（见表）

表——加分者和失分者

	衰退的民主国家	改善的民主国家	震荡国家	恶化的专制国家	改善的专制国家
大国	11	2	6	8	0
其他	19	4	6	22	11
总数	30	6	12	30	11
实例：大国					
	孟加拉(-10) 巴西(-14) 印度(-14) 印度尼西亚(-7) 墨西哥(-16) 菲律宾(-9) 波兰(-18) 南非(-9) 泰国(-17) 土耳其(-30) 美国(-9)	哥伦比亚(+9) 台湾(+10)	阿根廷 肯尼亚 尼日利亚 巴基斯坦 韩国 越南	缅甸(-27) 中国(-8) 刚果(金)(-6) 埃及(-13) 埃塞俄比亚(-8) 伊朗(-8) 俄罗斯(-15) 坦桑尼亚(-14)	无

实例：其他国家					
博茨瓦纳(-8)	马拉维(+10)	多米尼加共和国	阿富汗(-25)	亚美尼亚(+19)	
匈牙利(-26)	摩尔多瓦(+10)	厄瓜多尔	白俄罗斯(-11)	不丹(+28)	
毛里求斯(-13)	塞拉利昂(+8)	马达加斯加	柬埔寨(-11)	冈比亚(+27)	
突尼斯(-24)	东帝汶(+9)	北马其顿	莫桑比克(-15)	马来西亚(+9)	
乌克兰(-18)		斯洛文尼亚	乌干达(-8)	尼泊尔(+18)	
尼加拉瓜(-28)		赞比亚	也门(-15)	斯里兰卡(+12)	

资料来源：作者的民主量表，是自由民主的三个主要年度衡量数值的平均值：1)“自由之家的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综合数值”，2)“经济学人智库的民主指数，以及3)V-Dem的自由民主指数。

说明：“大国”是指人口超过5000万或2022年名义GDP超过5000亿美元的国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表中列出了在此期间下降或上升了至少5分的所有国家。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在此期间一国从最高值或最低值增加或减少的分数。

如果我们将范围扩大到所有人口超过一百万的国家，情况依然令人沮丧。在这16年中，总共有30个民主国家出现了衰退，只有6个民主国家在此期间改善了至少5分。在衰退的国家中，有一些不属于“大国”，但由于其示范效应，在政治上 also 具有重要意义：匈牙利自称是不自由的模式；乌克兰是俄罗斯侵略的最大民主受害者；突尼斯是获得民主（然后又失去民主）的阿拉伯国家；博茨瓦纳和毛里求斯是非洲仅有的两个自独立以来一直保持民主的国家（最近在这两个国家进行的“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调查显示，公众对民主表现的满意度急剧下降）。相比之下，有所改善的四个较小的民主国家是东帝汶、马拉维、摩尔多瓦和塞拉利昂——这些国家的总人口约为3400万，约占全人类的0.42%。

当我们审视这些数字、这些数字背后的相对国家权重，以及世界上专制国家的进一步严酷统治、许多民主国家的政治两极分化与不自由的民粹主义等趋势时，我们必须看到，我们仍然受困于一个强烈而持久的民主衰退中。我们需要一项战略来扭转这一局面。

合法性与绩效

这还不足以称为“第三次民主逆潮”(third reverse wave)。但是,随着民主的合法性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许多民主国家的表现疲软无效,以及全球力量对比的急剧变化,我们不能排除自由出现更加灾难性倒退的可能性。

让我们从民主合法性谈起。世界各地仍然存在对民主的广泛渴望。这种对民主的信念仍然十分普遍,足以支持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的说法,因为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都认为民主对他们的生活十分重要。²⁰在亚洲,日本、韩国和台湾对民主的支持依然强劲,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至少在名义上也是如此。²¹不过,普世价值最惊人的证据来自非洲。“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调查发现,36个国家中三分之二的非洲人仍然认为民主优于任何其他形式的政府。至少三分之二的非洲人拒绝接受任何一种威权的替代形式(一人统治、一党统治或军事统治)。²²

但遗憾的是,在一些非洲国家,对民主的支持明显急剧下降。其中最突出的是南非,在2022年,只有43%的人表示他们支持民主,而不是任何其他选择——在过去七年中,这一比例下降了21个百分点。²³在非洲,南非是这一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近一半人),他们表示,与政治上负责任的政府相比,拥有一个能够把事情做好的政府更为重要。种族隔离结束30年后,南非仍是世界上青年失业率最严重的国家之一(61%)。总体而言,三分之一处于工作年龄的南非人没有工作。²⁴毫不奇怪,自2015年以来,对南非民主运作方式的满意度下降了23个百分点,2022年仅有25%的南非人表示满意。

目前，南非正酝酿着爆炸性的不满情绪，不仅是对就业、经济增长和社会服务方面令人沮丧的不足，还有对“非洲人国民大会”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腐败猖獗的不满——这个执政党 30 年来从未面临过严重的选举挑战。如果南非滑向以种族怨恨为基础的不自由的民粹主义，这在 2024 年大选中很可能发生，那么这不仅是南非的悲剧，也是非洲大陆的悲剧。

正如利普塞特所解释 拉丁美洲的民意趋势也令人担忧。²⁵ 在整个地区的，合法性与政权绩效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对民主合法性的信念可能受到文化和历史的影响，但也受到当前政权对比过去政权在经济发展和绩效方面的驱动。

拉丁美洲的民意趋势也令人担忧。²⁵ 在整个地区，对民主的支持率已从 2010 年的 65% 下降到 48%。在该地区的第二大国家墨西哥，支持率为 35%。令人不安的是，年轻人对民主的支持率最低。在 25 岁以下的拉美人中，只有 43% 的人表示他们支持民主，而不是任何其他选择。在形式上民主的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对民主运作方式的满意度已降至极低水平（分别为 22%、17% 和 12%）。在过去八年里换过七位总统的秘鲁，这一比例为 8%。乌拉圭和萨尔瓦多是仅有的两个民主满意度占多数的拉美国家，在萨尔瓦多，攫权的威权总统纳伊布·布克尔 (Nayib Bukele) 因残酷镇压凶残的犯罪团伙而广受欢迎。²⁶ 在整个拉美地区，对民主的满意度从 2009 年的 45% 下降到去年的 28%。

同样，长期的糟糕表现重责难逃。犯罪和暴力事件频发，令选民惊惧。21 世纪初曾推动该地区发展的全球大宗商品繁荣已经结束。新的工作岗位、更高的工资和社会福利支出曾使该地区的贫困率从 27% 降至 12%，缓解了历史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²⁷ 但拉美经济仍然过于依赖大宗商品出口，价格往往受中国需求的推动。

正如利普塞特在其开创性著作中所解释的，合法性与政权绩效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对民主合法性的信念可能受文化和历史的影响，但也受到当前政权对比过去政权在经济发展和绩效方面的驱动。新生民主国家不能依赖传统作为合法性来源，而必须证明自己能够解决问题，实现人民对政府的期望。一个有成效的、长期的绩效记录——实现经济增长和提供机会、减少贫困和不平等、提供社会服务、控制腐败，以及维护政治秩序和安全——会储存合法性，可以用于在危机时期维持民主。然而，利普塞特告诫说，“即使在合法的制度中，效能的反复或长期崩溃，也会危及制度的稳定。”²⁸ 最危险的民主幻觉是永恒的自负 (vanity of permanence)，即认为，民主由于经过几十年的有效运作已经根深蒂固地合法化，因此永远不会瓦解。

民主在本世纪一直受到削弱，一个主要原因是其糟糕的经济和政治绩效。新生民主国家的缓冲期最短。突尼斯在 2011 年后向民主转型，但未能取得好绩效，公民厌倦了政客及肤浅政党的无能、分裂、机会主义和腐败。2019 年，选民们选出了“反政治” (antipolitical) 的民粹主义强人凯斯·赛义德 (Kais Saied) 为总统，然后当他在 2021 年的自我政变 (self-coup) 中关闭议会、夺取控制权时，他们袖手旁观甚至拍手称快。²⁹

然而，即使一个民主政体一开始就具有很高的合法性并持续了几十年，政治重力法则 (law of political gravity) 仍然适用。在某些时候，处于压力之下的民主政体必须站稳脚跟并有所作为，否则就会眼睁睁地看着公众的支持不断流失，不仅是对执政党的支持，也是对民主体制的支持。为了防止南非的螺旋式下滑，为了避免给更多国家的将军们提供夺权的借口，为了阻止像贝宁的帕特里斯·塔隆 (Patrice Talon) 或萨尔瓦多和突尼斯的总统

那样的独裁者破坏宪法规范，民主必须在遏制腐败、犯罪和滥用权力的同时，创造一定程度的经济繁荣和机会。

实力的重要性

自由和民主倒退的另一个原因，是全球权力和声望的平衡发生了变化。“在第三波浪潮中，美国和欧洲的压力、外交接触和支持往往能在危急情况下将天平倾向于成功转型（或避免民主消亡）。”³⁰但现在，华盛顿、布鲁塞尔和欧洲民主国家们较少可能施加压力——不仅是以制裁的形式，甚至是以外交努力和原则声明等较弱的形式——来反对民主倒退或承认民主倒退的存在。

这种不情愿使欧尔班没有被迫面对实质性后果就瓦解了匈牙利的民主。它给了亚历山大·武契奇 (Aleksandar Vučić) 总统空间操纵塞尔维亚回到竞争性威权主义，让他认为这样做不会影响塞尔维亚加入欧盟的申请。³¹这也让布克尔 (Bukele) 在萨尔瓦多的谋杀中逍遥法外。³²协调一致的外交压力仍然可以发挥作用捍卫民主，正如美国总统乔·拜登 (Joseph Biden) 的政府所展现的，它成功迫使巴西军队和政客尊重 2022 年的选举结果。³³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努力。给民主组织、政党、管理机构、运动、媒体和选举过程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种必不可少的工作仍在继续，但它缺乏外交支持和压力的协同作用，也缺乏时代所要求的更大规模的支持。

在推动民主方面的退缩——源于美国在伊拉克的建国努力未获成功、2008 年金融危机、社交媒体的极化效应 (polarizing effects)，以及全球化带来的各种压力——反映出在成熟的民主国家中，国家自信心和决心受到了更

广泛的侵蚀。这些虽然是全球力量的难以捉摸的面向，但却很重要。

客观而言，西方民主国家的力量也在减弱。自 2002 年以来，七国集团在全球 GDP 中所占的份额已从 42% 下降到 30%，而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及其他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则从 19% 上升到 32%。³⁴ 随着中国经济的停滞，印度在金砖国家经济增长和产出中所占的份额在不断增长。这些“新兴市场”国家中也有民主国家，但即使是这些国家，也倾向于将主权“不得被干涉”的种种解释，置于对民主和人权的关注之上。

世界上最强大的专制国家，主要是习近平的中国和普京的俄罗斯，越来越多地运用“锐实力” (sharp power) 来破坏和颠覆民主。这些隐蔽、胁迫和腐蚀性的举措旨在渗透、动摇和影响民主社会和机构。³⁵ 民主国家正在采取措施对抗“锐实力”，但即使是最富裕的民主社会也仍然容易受到北京、莫斯科、德黑兰和海湾君主国的影响，这些国家力图将威权主义的影响渗透到民主社会的公民生活中。未来我们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以捍卫我们的大学、研究企业和智库、我们的高科技创新、我们的私营企业、我们的报纸、广播和其他媒体、我们的地方政府、我们的政党、我们的社区组织和其他民间机构的道德操守和自主性，使他们不被暗中操纵而屈服于强大坚决的专制政权的企图。

争取独立、批判性的媒体和开放的信息流动的斗争尤为重要，因为独裁者极力歪曲新闻和叙事，向社交媒体和公共对话灌输虚假的、打击民主士气的的内容，这些活动会转移公众舆论，削弱公众对促进民主乃至对民主本身的支持。这一直是俄罗斯和中国在进行专门的努力来左右选举结果的同时，

而进行全球宣传的目的。

然后是军事力量的硬实力，普京的俄罗斯首先动用军事力量吞并了格鲁吉亚的部分领土，现在又试图摧毁乌克兰的民主和主权。俄罗斯在乌克兰如果获的胜利，将使普京更有胆量攻击前苏联其他现在民主的地区，并给整个地区投下更广泛、更黑暗的暴政阴影。自 2022 年 2 月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开始以来，普京已将他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极权国家，其扩张主义政权不容许任何异议。³⁶与此同时，习近平的中国拥有世界上扩张最迅速的军队，正利用其不断壮大的海空军控制南海，并向台湾施压，压迫其放弃民主，与北京“统一”。如果习近平的计划得逞，亚洲的自由前景将急剧坠落，而在世界不同国家，攫取权力的独裁者而非宪政民主似乎将成为未来的潮流。

这就是为什么保卫乌克兰和台湾以及东欧和东亚其他濒危民主国家，是同一事业的一部分。尽管情况更为复杂，但我认为，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以色列国的存在也是如此。如果我们退缩，不捍卫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国家以民主方式存在的权利，那么我们不仅抹杀了以色列历史上合法的建国诉求，而且还使那些使用暴力来达到其目的的独裁者合法化、得到奖励。这并不是要评判，如果能够与巴勒斯坦人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犹太国的边界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并不是要忽视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所造成的惊人的人道主义灾难。这是一个最起码的主张：我们不能允许一个民主国家被侵略、恐怖和恫吓从地图上抹去。

世界的自由事业是不可分割的。当民主面临强大的独裁政权，它们否认民主的合法性，压制人民的权利，审查信息并传播虚假信息 and 谎言时，民主

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无法得到保障。每一次民主的丧失或失败都会产生潜在的扩散和示范效应。同样，每一次民主的诞生或捍卫，都会成为希望、指导和激励的源泉。

“现实主义者们”说，我们与这些独裁政权打交道的规则应该是“自己活，也让他们活”。当然，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避免战争。但是，独裁国家及其镇压方式不可能与自由民主国家和平共处，因为独裁者面临着根本的合法性困境。由于无法通过自由的政治竞争来延续其权力，他们很容易遭遇合法性危机——就像苏联所面临的那样，遭遇缓慢蔓延地犬儒主义(cynicism)和离心(detachment)，同时，民众的不满和厌恶突然高涨而将其抛弃的可能性始终存在。

这是独裁政权挥之不去的“大恐慌”(Great Fear)。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信息的自由流动、独立的研究、批判性的辩论以及教育和艺术领域的另类思想感到如此有威胁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必须主宰信息和思想的领域。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他们不能灌输对统治者的忠诚奉献，他们至少必须制造恐惧、仇恨和顺从。

对于独裁者来说，对他者的恐惧——某些容易被妖魔化的少数群体，如罗姆人(Roma)、犹太人、穆斯林、移民、LGBTQ群体，以及任何形式的他者——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他们所能提供的只是经济绩效的纪录，那么这种纪录可能转瞬即逝。当他们不再改善人们的生活时，人们就会问：“你最近为我们做了什么？”然后人们就不会再讨价还价了，不会说“我们会放弃自由来换取发展”了。如果你是伊朗的阿亚图拉(ayatollahs)、俄罗斯的普京，或是缅甸、朝鲜、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等其他破产威权国家的继承者——

如果你是中国的习近平，眼看着经济增长衰退、资产缩水、资本外逃——你就必须依靠每个独裁者都不可或缺的武器：恐惧。恐惧于不确定性，恐惧于内部危险的少数群体，恐惧于外部的敌人。

恐惧会被用来助长侵略性的、仇外的民族主义。如果你不能给你的人民以个人尊严和繁荣发展的机会，那么你就用极端民族主义的故事来轰炸他们，让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伟大民族计划的英雄，看作是注定要战胜敌人的英雄。你会宣扬光荣的民族主义目标：统一祖国，征服所谓失去的领土，追求地区或全球权力——宰制弱小国家。这是一个古老而丑陋的故事；其危险性是无数的无谓战争的惨痛教训。

在今天对世界和平最重大的挑战——俄罗斯对乌克兰无端发动的野蛮战争中，我们面对的正是这一基本而古老的真理。 Hamas大规模屠杀无辜的以色列人，这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犯罪组织发动的一场虚无主义的反犹战争。伊朗的原始神权独裁政权对 Hamas和该地区其他恐怖主义代理人提供了支持。假如你是习近平，面对统治下日益萎缩的人口、停滞不前的经济、被欺凌和奴役的商业阶层，而你的控制意识形态和创造历史伟业的野心岌岌可危，你就会对台湾发动一场网络、政治、经济和渐进式军事侵略的运动，目标是最终吞并这个自由之岛，就像最近吞并香港一样。自 2020 年以来，习近平对香港的公民自由和政治多元化进行了无情打击，已经表明他决意要扼杀自由，这最终揭示了北京的“一国两制”承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³⁷

实力仍然很重要。这包括实力的最基本和悲剧性 (tragic) 的要素，即动员和击退暴力的能力。

正如军事力量试图重塑边界一样，军事力量也塑造着人们的期望。这就是国际关系理论家所说的“从众效应”(bandwagon effect)，也是德语中的“时代精神”(Zeitgeist)。如果民主国家软弱无能、优柔寡断(然后遭受军事失败)，或者在面对专制侵略时畏缩不前、推诿扯皮，那么我们失去的将不仅仅是被击败的民主国家。其他许多国家和社会都将与新的专制巨头同流合污——或以其为榜样，将其视为力量和成功的化身。在一个没有规则的世界里，人们将站在强者的身后。

民主不能是软弱的。民主不能在战场上失败。这就是为什么乌克兰击败俄罗斯的侵略对于全球自由的未来至关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必须让哈马斯丧失能力，并使其作为恐怖组织失去合法性，同时尽一切可能维护无辜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以及他们建立自己国家的合法诉求。这也是为什么自由民主国家必须明确表明他们有意帮助台湾自卫的原因。

在谈判桌上、在联合国大会上、在辩论台上、在开发新技术的竞赛中、在课堂上，最重要的是在塑造人们思想和信仰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民主都输不起。民主国家经不起分裂，政界和公民社会的民主人士必须团结起来，共同认识、对抗和抵制威权主义，为重塑世界秩序而努力。

来自这场全球斗争的消息并非全是坏消息。民主的对手们深感焦虑。他们统治下的人口正在老化，甚至正在萎缩。他们的经济也深陷困境。它们不是——或者就中国而言，不再是——成功的典范。

不同党派、意识形态、民族和文化的民主人士都有一个积极的议程要提出。它提供了生活在尊严、真理中的机会和人类自由的无限创造力的可能性。

它包括维护自由的能力，通过理性说服与和平变革纠正政策和治理失败的能力，以及通过只有民主才能提供的手段改善社会的能力：自由和公平的权力竞争、包容性的参与、开放的信息流动、对野蛮权力的限制，以及保障每个人权利的全面法治。相比之下，独裁政权只能提供冷酷的、有辱人格的交易：放弃你们的自由，我们会给你们秩序，也许还有（暂时的）繁荣。

独裁者们知道，他们的人民不想要、或不会无限期地接受独裁者的交易。缅甸人民不想要这种交易。这就是为什么缅甸的镇压军队向自己的人民开战——镇压力量正在输掉这场战争。伊朗人民不想要这种交易。这就是为什么在阿亚图拉们 (ayatollahs) 的道德警察因一名年轻妇女马赫萨·阿米尼 (Mahsa Amini) 的衣着问题将其殴打致死一年多之后，在“女性、生命、自由”抗议活动中五百多名伊朗人丧生、两万人被捕之后，民间抵抗仍在继续。这也是伊朗的纳尔吉斯·穆罕默迪 (Narges Mohammadi) 因其捍卫人权的非凡勇气而荣获 2023 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原因。

委内瑞拉人民不想要这种交易。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八年里，有 700 万人——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逃离了这个国家。非洲人民不想要这种交易。这就是为什么即使面临多党政治的种种挑战和失望，仍有四分之三的非洲人表示，他们希望通过“定期、公开和诚实的选举”来选择自己国家的领导人。

毫无疑问，乌克兰人民也不想要这种交易，因此他们正在忍受巨大的困难和牺牲，来抵抗俄罗斯的侵略，捍卫他们的民主。

权力与合法性

权力与合法性，是决定由谁来统治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你能掌握的权力越多，你需要的合法性就越少。反之亦然。但合法性也是权力的一种形式。伟大的捷克民主主义者瓦茨拉夫·哈维尔 (Václav Havel) 明白，否认不公正政权的合法性，“生活在真实中”并拒绝合作，哪怕是以平凡的方式，也是一种权力的形式，即“无权者的权力”。³⁸

“无权者的权力”的运用，帮助推动了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初独裁政权的垮台。当时，权力与合法性汇聚在一起，支持着世界各地的自由运动。

而现在，我们正在败给咄咄逼人的专制国家和披着民主外衣的独裁者。当强大的专制国家对民主及其价值观发起强劲的、技术娴熟的攻击时，我们却从意识形态斗争中退却了。

退缩的不是缅甸、白俄罗斯或委内瑞拉的人民，也不是去年被将军、党派机会主义者和权贵所组成的犬儒 (cynical) 联盟夺走民主选举胜利的泰国人民。不是伊朗的自由运动，也不是其象征纳尔吉斯·穆罕默迪 (Narges Mohammadi)。不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以及许多其他国家) 勇敢的记者，他们在流亡中继续报道专制的真相，这是他们对抗专制的唯一方式。不是突尼斯的穆斯林民主党领袖拉希德·加努希 (Rached Ghannouchi)，他去年因坚持要求总统赛义德 (Saied) 恢复民主而在 81 岁时成为政治犯。不是新闻出版人和民主捍卫者黎智英 (Jimmy Lai)，已经年过七旬并且非常富有的他，在几年前返回香港，宁可面对终身监禁的前景，也不放弃他在香港的记者同仁和自由事业。不是斯瓦特兰娜·齐哈诺夫斯卡娅 (Sviatlana Tsikhanouskaya)，她的丈夫因在 2020 年总统选举中挑战白俄罗斯独裁者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Alyaksandr Lukashenka) 而入狱，她挺身而出领

导这场运动，现在她在流亡中继续这场运动。不是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 (Vladimir Kara-Murza)，尽管他因反对普京的腐败独裁统治而面临数十年监禁的威胁（现已成真），但他还是于 2022 年返回了俄罗斯。也肯定不是俄罗斯民主反对派领袖阿列克谢·纳瓦尔尼 (Alexei Navalny)，他比卡拉-穆尔扎早一年返回俄罗斯，面临同样的前景，现在他付出了最终的代价，最近在狱中死于俄罗斯政府之手。

从斗争中退缩的不是他们，而是那些拥有财富和资源的民主国家。我们并没有为了民主与自由，以我们应该投入的全部能量、资源、信念、协作和技术创造力，来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规则的斗争和信息的斗争，而这正是时代所要求的。

我们必须再次认真地传授和传播民主的价值观、经验、要求和制度设计。我们必须以必要的规模、在多种语言的范围和门径上开展这项工作。我们必须更加认真地反击威权主义的虚假信息和影响力，揭露他们的谎言、歪曲和自私目的。我们必须为民主运动和出版物提供技术和资源，以比现在更大量、更有魄力的规模，来报道新闻、开展民主教育和反击威权主义宣传。

如果我们想恢复全球的民主势头，我们就需要证明一些东西。我们必须证明，以自由和法治为基础的民主，对抗独裁的压迫和专制，是一种在道义上和实践上都更胜一筹的政府形式，实际上也是确保或能够确保人类尊严、和平与繁荣的唯一政府形式。要证明这一点应该不难，因为这是事实。³⁹但这需要资源、想象力，以及对这一事业背后的道德迫切性以及对其的持久承诺的信心重建。

藏传佛教僧侣、人权活动家、电影制片人、前政治犯、可敬的果洛久美 (Golog Jigme)，在代表当年所有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被监禁或被杀害的人，接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颁发的 2023 年度民主奖时，提出了在这场斗争中应该支撑我们的信息：

独裁者抵制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对自由的渴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它永远不会被熄灭——不会通过宣传，不会通过审查，当然更不会通过暴力。正因为如此，我知道自由必胜，独裁者必败，我们绝不能放弃！⁴⁰

作者感谢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 (Smith Richardson Foundation) 对本文研究的支持。

注释

- 1 约尔根·埃克利特和帕勒·斯文森：《选举监督的兴起：是什么让选举自由公正？》(Jørgen Elklit and Palle Svensson, “The Rise of Election Monitoring: What Makes Elections Free and Fair?”, *Journal of Democracy* 8 (July 1997): 32–46.)
- 2 金·莱恩·谢佩勒：《维克托·奥尔班是如何获胜的》(Kim Lane Scheppele, “How Viktor Orbán Wins”, *Journal of Democracy* 33 (July 2022): 45–61.)
- 3 史蒂文·莱维茨基和卢坎·A·韦：《民主令人惊讶的韧性》(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A. Way, “Democracy’s Surprising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34 (October 2023): 5–20).
- 4 我在这里计算的是人口超过一百万的国家，因为人口较少的国家会严重扭曲情况。在 37 个小国中，34 个 (92%) 是民主国家，其中 29 个 (78%) 是自由民主国家。如果我们把剩下的 157 个人口超过一百万的国家都算在内，那么只有不到一半的国家是民主国家，只有 30% 的国家是自由民主国家。
- 5 亚当·乔丹和奥拉西奥·索里亚：《总统大选对未来提供了相互冲突的愿景，阿根廷前途未卜》(Adam Jourdan and Horacio Soria, “Argentina on a Knife-Edge as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fers Clashing Visions of the Future”, Reuters, 17 November 2023, [www.reuters.com/world/americas/argentina-knife-edge-presidential-election-offers-clashing-visionsfuture-2023-11-17.](https://www.reuters.com/world/americas/argentina-knife-edge-presidential-election-offers-clashing-visionsfuture-2023-11-17/))
- 6 康斯坦萨·兰伯图奇和玛尔·森特纳拉：《哈维尔·米莱的极右翼威胁打破关于阿根廷军事独裁统治的共识》(Constanza Lambertucci and Mar Centenera, “Javier Milei’s Extreme Right Threatens to Break Consensus on Argentina’s Military Dictatorship”, *El País* (Buenos Aires), 5 September 2023, <https://english.elpais.com/international/2023-09-05/>)

javier-mileis-extreme-right-threatens-to-break-consensus-on-argentinias-military-dictatorship.html.)

- 7 爱德华多·阿莱曼和帕蒂西奥·纳维亚：《智利失败的宪法：民主获胜》(Eduardo Alemán and Particio Navia, “Chile’s Failed Constitution: Democracy Wins”, *Journal of Democracy* 34 (April 2023): 90–104.)
- 8 莱维茨基和韦：《民主令人惊讶的韧性》(Levitsky and Way, “Democracy’s Surprising Resilience”)
- 9 托马斯·金斯伯格和阿齐兹·胡克：《民主险些失败》(Thomas Ginsburg and Aziz Huq, “Democracy’s Near Misses”, *Journal of Democracy* 29 (October 2018): 16–30.)
- 10 劳拉·甘博亚：《反对派如何反击》(Laura Gamboa, “How Oppositions Fight Back”, *Journal of Democracy* 34 (July 2023): 92.)
- 11 “自由之家”解释说，“选举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 的标签适用于所有“在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方面达到某些最低标准”的国家，但附带条件是选举民主“不应等同于‘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自由民主’一词意味着对民主理想更有力的遵守和更广泛的公民自由。”请参阅“2023 年世界自由度的方法论问题”(Freedom in the World 2023 Methodology Questions, https://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2023-03/FITW_2023%20MethodologyPDF.pdf) 因此，所有自由民主国家也是选举民主国家，但并非所有选举民主国家都符合自由民主国家的条件。
- 12 三项调查中至少有一项将这两个国家分别归类为非民主国家，但它们对这两个国家的看法并不一致。
- 13 玛雅·图多尔：《为什么印度的民主正在消亡》(Maya Tudor, “Why India’s Democracy Is Dying”, *Journal of Democracy* 34 (July 2023): 125.)
- 14 图多尔：《为什么印度的民主正在消亡》(Tudor, “Why India’s Democracy Is Dying”, 125.)
- 15 “自由之家”：《2023 年的网络自由：人工智能的压制力》(Freedom House, Freedom on the Net 2023: The Repressive Power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ttps://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2023-10/Freedom-on-the-net-2023-DigitalBooklet.pdf>, 26–27.)
- 16 图多尔：《为什么印度的民主正在消亡》(Tudor, “Why India’s Democracy Is Dying”, 127.)
- 17 苏米特·甘古利：《莫迪未宣布的紧急状态》(Šumit Ganguly, “Modi’s Undeclared Emergency”, *Journal of Democracy* 34 (July 2023): 145); 苏米特·甘古利、丁莎·米斯特里和戴雅门编辑的《印度令人担忧的民主状况》(Šumit Ganguly, Dinsha Mistree, and Larry Diamond, eds., “The Troubling State of India’s Democrac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24).)
- 18 托马斯·卡罗瑟斯：《转型范式的终结》(Thomas Carothers,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Democracy* 13 (January 2002): 5–21); 吉列尔莫·奥唐纳：《关于巩固的幻想》(Guillermo O’Donnell, “Illusions About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7 (April 1996): 34–51.)

- 19 有几个国家，我也放在一组，它们变化了5个点左右，但2022年发现它们与2006年的情况大致相同。这些振荡国家(oscillators)包括阿根廷和韩国(民主质量先下降然后恢复)，以及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民主质量先提高，后又回落到2006年令人失望的水平)。
- 20 阿马蒂亚·库马尔·森：《作为一种普世价值的民主》(Amartya Kumar Sen, "Democracy as a Universal Value", *Journal of Democracy* 10 (July 1999): 3–17.)
- 21 戴雅门：《东亚国家支持民主的趋势》，收于朱云汉等人编辑的《亚洲人如何看待民主合法性》(Larry Diamond, "Trends in Support for Democracy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in Yun-han Chu et al., eds., *How Asians View Democratic Legitimacy*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23), 18–31.)
- 22 我感谢“非洲晴雨表”及其前执行主任E·吉马·博阿迪(E. Gyimah-Boadi)与我分享这些数据。
- 23 最新的“非洲晴雨表”调查(第9轮)于2022年11月进行。比较对象是第6轮调查，其南非部分是在2015年6月进行的。
- 24 林赛·丘特尔：《在南非寻找工作的一年令人愤怒和羞辱》(Lynsey Chutel, "One Year in the Infuriating and Humiliating Search for a Job in South Africa", *New York Times*, 12 November 2023.)
- 25 我非常感谢“拉美指标”(Latinobarómetro)的执行主任玛尔塔·拉戈斯(Marta Lagos)与我分享这些数据。
- 26 在布克尔的领导下，对萨尔瓦多“民主”运作的满意度从2018年的11%飙升至2023年的64%。他的公众信任度高达86%，是迄今为止拉美国家总统中最高的。
- 27 拉维·巴拉克里希南和弗雷德里克·托斯卡尼：《大宗商品繁荣如何帮助拉丁美洲解决了贫困和不平等问题》(Ravi Balakrishnan and Frederik Toscani, "How the Commodity Boom Helped Tackle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IMF Blog, 21 June 2018, www.imf.org/en/Blogs/Articles/2018/06/21/blog-how-the-commodity-boom-helped-tackle-poverty-andinequality-in-latin-america.)
- 28 西摩·马丁·利普塞特：《民主的一些社会要求：经济发展与政治合法性》(Seymour Martin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 (March 1959): 89.)也参见利普塞特的《政治人：民主的社会基础》和《第一个新国家：历史和比较视角下的美利坚合众国》(See also Lipset,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Democracy*, updated e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and *The First New Nation: The United States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3).)
- 29 内特·格鲁曼：《突尼斯政变：转型受阻》(Nate Grubman, "Coup in Tunisia: Transition Arrested", *Journal of Democracy* 33 (January 2022): 12–26); 丹尼尔·布鲁姆伯格：《突尼斯破碎的民主：初步评估》(Daniel Brumberg, "Tunisia's Broken Democracy: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Arab Center, 12 May 2023, <https://arabcenterdc.org/resource/tunisia-broken-democracy-a-preliminary-assessment>.)
- 30 戴雅门：《民主之弧：从复兴到濒危(扩展版)》(Larry Diamond, "Democracy's

- Arc: From Resurgent to Imperiled (Expanded Edi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January 2022, www.journalofdemocracy.org/articles/democracys-arc-from-resurgent-to-imperiled-expanded-edition/#f54-text.)
- 31 穆罕默德·塞兹金:《塞尔维亚:一个竞争性威权主义的案例》(Mehmet Sezgin, “Serbia: A Ca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Democratic Erosion Consortium, 5 January 2023, www.democratic-erosion.com/2023/01/05/serbia-acase-of-competitive-authoritarianism/.)
- 32 劳拉·甘博亚:《反对派如何反击》(Laura Gamboa, “How Oppositions Fight Back”, *Journal of Democracy* 34 (July 2023): 90–104.)
- 33 迈克尔·斯托特、迈克尔·普尔和布莱恩·哈里斯:《美国捍卫巴西选举的谨慎活动》(Michael Stott, Michael Pooler, and Bryan Harris, “The Discreet U.S. Campaign to Defend Brazil’s Election”, *Financial Times*, 21 June 2023.)
- 34 詹姆斯·伊格尔:《动画图表:按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七国集团与金砖国家的对比》(James Eagle, “Animated Chart: G7 vs. BRICS by GDP (PPP)”, *Visual Capitalist*, 27 July 2023, www.visualcapitalist.com/cp/animated-chart-g7-vs-brics-by-gdp-ppp/); M.G. 钱德拉坎特:《基于购买力平价,金砖国家GDP如何超越七国集团》(M.G. Chandrakanth, “How BRICS Countries Have Overtaken the G7 in GDP Based on PPPs”, *Times of India*, 9 April 2023,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blogs/economic-policy/how-brics-countries-have-overtaken-the-g7-in-gdp-based-on-ppps/>.)
- 35 克里斯托弗·沃克:《什么是锐实力?》(Christopher Walker, “What Is Sharp Power?”, *Journal of Democracy* 29 (July 2018): 9–23), 《迎接锐实力的挑战》(“Rising to the Sharp Power Challenge”, *Journal of Democracy* 33 (October 2022): 119–32); 拉里·戴蒙德:《逆风:从俄罗斯的愤怒、中国的野心和美国的自满中拯救民主》(Larry Diamond, “Ill Winds: Saving Democracy from Russian Rage, Chinese Ambition, and American Complacency” (New York: Penguin, 2019).)
- 36 安东·特罗伊诺夫斯基等:《俄罗斯政府如何压制战时异议》(Anton Troianovski et al., “How the Russian Government Silences Wartime Dissent”, *New York Times*, 29 December 2023.)
- 37 许田波:《镇压:香港面临天安门 2.0》(Victoria Tin-bor Hui, “Crackdown: Hong Kong Faces Tiananmen 2.0”, *Journal of Democracy* 31 (October 2020): 122–37.)
- 38 参见哈维尔 1978 年的文章《无权者的权力》(See Havel’s 1978 essay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www.nonviolent-conflict.org/wp-content/uploads/1979/01/the-power-of-the-powerless.pdf.)
- 39 《民主案例:报告》(“Case for Democracy: Report,” V-Dem Institute, March 2023, www.v-dem.net/documents/34/C4DReport_230421.pdf)
- 40 果洛久美:《在国家民主基金会四十周年庆典上的致辞》(Golog Jigme, “Remarks to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s Fortieth-Anniversary Celebration”, Washington, D.C., 14 November 2023.)